

政大史粹第 36 期
2021 年 9 月，頁 203-206
DOI: 10.30384/CHNCCU.202109_(36).0008

書評

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 by Robert Cul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xv+371.

張志誠*

本書作者 Robert Culp 為康乃爾大學博士，現服務於美國 Bard College，長期從事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與知識份子研究。Culp 的第一本書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¹ 探討長江中下游的教育者如何教導學生成為具有公民意識的青年公民，其中 Culp 注意到出版工業對近代中國的思想與文化有相當大的影響，而第二本書 *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則更進一步強調新式出版業工業化的鮮明特性，並思考近代中國出版業的發展以及知識人在其中的作用與影響。

工業化的生產模式與機器印刷技術源自西歐國家，在 19 世紀逐漸傳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¹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中國，並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逐步發展成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幾家重要的出版社。然而，這套模式並非一成不變地被複製到中國，事實上在西歐，編輯、印刷與發行各自獨立，而中國則是相當特殊地將三者集於一家出版社，並由知識人在背後維持運作。作者透過中西對比，指出工業化的出版活動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知識人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對於晚清以降的知識人而言，失去科考仕進之後，投入出版事業，一方面有助於教育、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更能藉此累積社會與文化地位，成為他們自我肯定的一種方式。作者注意到書籍的工業化出版模式在中國特殊的發展型態以及知識人在當中的重要性，因此透過爬梳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與世界書局等幾家重要的新式出版機構在晚清至中共建國初期，如何發展工業化出版的生產模式？以及作為編輯或管理者的知識人，如何適應這套生產機制？並且透過出版書籍展現他們對於社會、文化的貢獻以及自我認同。

本書在章節方面，分為三部分，共七章。第一部份探討晚清以降，出版社的編譯所組織化的過程，以及編輯與出版機構管理者對於組織型態的期待是什麼？作者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草創時期為例，指出商務印書館早期並未迅速地建立嚴謹的組織制度，而是透過文人網絡作為尋覓人才、搜羅稿件的途徑，傳統文人的互動模式更形塑早期編譯所的內部風氣。商務印書館的組織方式，後來受到繼起的中華書局等出版社效仿。然而，編輯所缺乏清楚的組織規範、明確的分工方式以及有順序的生產流程，不利於工業化生產，到了 1920 年代成為出版社擴大版圖時的隱憂。因此，在 1920-1930 年代，各家出版社陸續調整組織結構，走向專業分工、流線式的圖書生產，此舉讓出版社逐漸褪去傳統文人風尚，並將知識人納入工廠式的生產管理。在專業化、工廠化的出版社裡，雖然自由程度相對於以往大受限制，但在編輯們的積極爭取下，出版社仍會給予一定程度的學習資源與晉升機會。出版社與知識人之間，維持著既學院化又工廠化的組織共識，直到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因為出版社收支困難以及教科書由國家統一編輯，無奈下只好縮減編輯部門規模以及終止過去承諾的福利。

第二部分作者從文化生產的面向，分析投身於工業化的出版活動的編

輯們，如何透過出版對社會、文化產生貢獻。作者將出版社編輯定位為「小知識人」(Petty Intellectuals)，認為這群具備基礎知識以及一定書寫能力的人，對於引介新知與保存傳統知識有所貢獻。在近代中國吸收新學問的過程中，各家出版社推出的《辭源》、《辭海》等工具書與語文教科書是學生認識新詞彙與白話文書寫形式的重要媒介，而中華書局的「新文化叢書」、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與世界書局的「ABC叢書」更是學子與大眾吸收新思想的領航員。在傳統古籍的閱讀與保存方面，商務、中華等各家編輯們積極搜羅與翻印傳統古籍，使大眾有機會閱讀過去許多只流通在少數藏書家手上的古書。整體而言，這些小知識人透過參與出版活動，成為近代中國知識、文化建構的重要幫手，並藉此提升自身的社會文化地位，以及強化作為知識人的身份認同。

第三部分作者思考從中共建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新政治體制下，商務、中華等出版社發生什麼轉變？他們該如何在新體制中圖存？而知識人是否還有機會透過參與出版活動，追求商業利益與完成自我實現？作者指出在中共在 1954 年實施公私合營政策後，國家透過安插黨幹部滲透並控制民營出版機構，並學習蘇聯設立出版總署，統籌管理文化出版活動。在政府出版機關的控制下，各家出版社得按照國家規劃的出版計畫，編輯印刷指定的出版物，成為中共灌輸社會主義思想的工具。雖然在 1950 年代傳播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共政權的主要目標，但為了推進國家的發展，出版社在政府允許下，得以出版政治正確的古籍、工具書以及科學書籍。因為有生產知識的需求，編輯在中共建國後仍然被需要，並且有機會與主管機關表達編輯出版的想法以及談判生活待遇，只是政治環境已經不允許他們自由自在地生產知識。

本書最精彩之處莫過於作者嚴謹地透過爬梳、整理橫跨半世紀的日記、回憶錄以及檔案，指出過去討論思想文化變遷時，一群不被重視的出版社編輯們其實是推動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幕後功臣，同時編輯們透過從事出版工作，找到提升社會、文化地位，以及自我肯定的方式。由此，作者成功地定位「出版」行動的意義，以及出版社編輯作為知識人的時代意義與重要性。此外，中共建國初期的出版史研究直至今日仍是學界較少涉

足的領域，本書第三部分探討中共利用出版機構進行社會主義思想宣傳，以及出版商與黨、出版總署協調的過程，加深學界對於 1950 至 1960 年代中國出版史的認識，奠定未來研究者探討 1949 年以後出版史研究的基石。本書觀察視角獨到、資料充實、邏輯縝密，並且架構清晰、文字優美，實為後輩學習的對象。筆者在閱畢後，有一處稍感意猶未盡。本書的重要論點之一，作為小知識人的編輯透過出版教科書、古籍與叢書對中國近代社會、文化的發展有所貢獻，同時亦藉此提升自己的社會、文化地位與自我認同。筆者認為出版活動固然能發揮一定的社會與文化影響力，但是工業印刷出版活動視商業利益為主要目標，此處或許能再多加考慮書籍出版後的市場反應，分析究竟這些出版品在市場上受到學生、文人或圖書館親暱的程度如何？若能說明市場接受度，則更能證明小知識人提升地位與自我認同的幅度。

本書探討晚清民國時期的小知識人在工業化生產的出版社裡，透過編輯出版書籍，改變中國近代的社會與文化，實為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研究的力作。這樣的研究視角，更開拓中國近代出版史的新視野，激發後學由此取徑思考同樣作為知識人的作家、讀者或者具備一定識字能力的印刷工人，他們與工業印刷出版的生產模式之間的互動情形，如何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